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专访英国学派理论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教授

□刘德斌

[编者按]巴里·布赞(Barry Buzan)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知名学者,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过去十年来,中国翻译出版了10本巴里·布赞教授的学术著作,包括《人、国家与恐惧》、《无政府逻辑》、《新安全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和《美国与诸大国》等。2012年10月布赞教授应邀来吉林大学讲学并接受了《中国与世界》主编刘德斌教授的采访,就当代世界的转型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等问题回答了本刊的提问。他认为当代世界正处于农业权力模式与传统文明让位于现代性和工业文明这一历史过渡的尾声;中国在冷战终结之前就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可能比后来我们看到的苏联解体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努力是当代世界多元现代性的一种方式;中国等新兴大国应该积极参与到世界治理中来;随着“他者”的崛起,超级大国将走向终结,我们将进入一个拥有众多大国和地区大国的世界,一个更地区化和去中心化的世界。

刘: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世界局势正在以超出人们想象和预测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可以判定,当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这不仅表现在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还表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把

世界各个角落都卷入到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来了。可以想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要重塑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还要重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不知您是否这样看?您对当代世界的转型有什么看法?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对当代世界的转型更为敏感,因为多少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寻求一种解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协调关系。比如,中国历史的断代与世界历史的断代如何协调起来?您认为当代世界的变革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翻开不同国家编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您会发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差异很大。比如有西方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把清王朝的建立作为现代中国崛起的开始,而中国人自己却把中国现代(modern,中国人翻译成“近代”)史的起始划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您也把公元1500年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呢?如何看待当代世界的转型与中国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关系呢?

布:关于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中国是最强大的传统大国之一,同时也是距离西方国家最远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是最后一块获得现代化的区域。它最善于维护自身的传统。从这一点看,也许将1911年视作中国迈向现代性的转折点是不无道理的。将西方强迫中国打开国门的1840年作为基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直到1911年,奉行现代性的改革者才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内战期间,中国自身成为了20世纪全球关于应该采取何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中的一部分。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异乎寻常地使得中国与现代化的接触转向另一种模式。在冷战这一20世纪最后一轮决定何种政治模式可以继续推进现代性的斗争的背景下,中国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对我来说,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如此之晚地迎接现代性,以及为何转型的过程如此之难。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中最强大、也是距离欧洲最遥远的一个。因此,西方对中国进行渗透的时间最长。而中国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规模且困难的转型在时间上非常紧迫。

当然,中国的情况反映出自19世纪以来现代性内部逐渐展开的紧张关系。实现现代性很明显有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在20世纪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塑造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冲突。中国在世界历史这一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苏联以及民主世界并肩反抗法西斯国家,之后中国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但是在冷战终结之前,中国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国际事件。我认为这也许比10年之后苏联的解体还要重要。这一行动使中国赶上了现代性的潮流。发

生在中国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更广泛的现代化内部紧张态势的一个反映。

所以从这一点看,我对于多元现代化的观点感到很振奋。19世纪催生了一系列新观念和权力模式的转型。这些观念随后在很多文化中开始发挥作用,当然首先在它们最先成型的欧洲文化背景中起到作用。但即使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还是表现出了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对现代性的基本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反应,所以存在着很多接受现代性的方式。在相当早的时期,美国发展出有别于欧洲的自己的现代性模式:美国永远视自己为终极现代性国家,是现代性的样板。当然,你可以看到现代性在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表现为自由的模式、民主的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集权的模式等。甚至那些在表面看起来大规模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地方,也在无意识中采取了现代性的框架。甚至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表现得像现代性组织一样。他们推动大型的社会工程,积极地将社会向某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形式推进。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多元现代性的世界里,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中国社会与现代性的相遇有着自己的特色,经过长时期的国内斗争后,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构建。我们仍然不太清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它将不同于美国式的现代性或是欧洲式的现代性。因为近似的文化,中国看起来和日本式的现代性会有些相似。中国会发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已加入到多元现代性的行列中来。大体上,这就是我对你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的问题的答案。

关于世界的转型问题,我们现在多多少少处于农业权力模式与传统文明让位于现代性和工业文明这一过渡的尾声。这一转型的首要特点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平等。现代化仅在少数地区发生,这些地区因此极度强大起来,塑造了过去150—200年的国际政治。越来越多的人群和文化正在获得现代化的机制并增强了对它的理解,以使其适应各自的社会。我们现在正来到这一过程的尾声。现代化的力量已不再集中于少数的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国、巴西以及其他国家也获得了现代化的力量。虽然西方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强大,但它相对地衰落了。当最先出现在少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产生的非常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与权力之间的巨大差距逐渐消失时,也就标志着世界向现代化过渡的完成。因此,我们现在正在步入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终点所定义的世界。我认为,我们正在向着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化世界前进。在这样的世界中,权力仍然在国家与社会内部及其之间广泛地分布着。社会正在获得更大的权力。权力会更广泛地分布。在国家层面,我认为超级大国将会走向终点。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积累起必要的相对资源

以成为超级大国。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并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拥有众多大国和地区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将无力承担超级大国的角色,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担这一角色。这就是主要的权力转移。

刘:西方学术界经常有人谈到“他者的崛起”(rise of the rest),这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近些年来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情形,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注目。但中国是以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与建设者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与西方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战略。中国的开放最早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并不想,也不具备重构世界秩序的能力。中国寻求的是与所有能够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经济力量的对比近年来确实发生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变化,美国和欧洲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可能将会越来越把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在国际危机面前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当世界再次遭遇重大危机,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做好准备承担起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共同承担责任时,美国和欧洲国家由于陷入国内经济与社会矛盾而直接和间接地采取收缩战略或尽力转嫁危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世界将会怎样?将会发生什么?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

布:我同意这一点。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危险。你的设想也许会变成现实:西方正处于衰落之中,他者无法或没有意愿去领导,这样,权威和合法性就会衰落。但是西方的衰落不会像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样,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也不会像苏联一样消失。西方仍会维持强大的影响。所以欧洲的衰落并不是全面的衰落。日本也不会全面地衰落,美国也不是,而只是越来越多的他者开始加入到大国和地区大国的行列当中。这是因为,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拥有众多大国但是没有有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支配整个体系的世界当中。

这里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这一点你也是对的。中国现在不断地向外界宣称:“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使世界担心的额外实力;世界应当感到满意,因为我们的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更多的贸易、科学、技术与文化对整个人类都是有益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是如果更多的崛起中国家在挑战西方角色的同时却不愿承担责任,那么世界就将成为没有领导者。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些领导能力。你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这个世界正变得难以治理。没有国家承担起治理全球的责任,其实这一角色本身也已失去了合法性。

这是我的去中心化全球主义论点的一个版本。我认为不承担责任有其弊

端。举中国为例,中国非常清楚它的繁荣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如果国际市场无人治理并开始四分五裂,如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一样,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意识到它们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如果它们不承担责任,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问题在于情势要恶化到何种程度时,才能够使它们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

人们至今对于环境问题处理上的共同利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泰坦尼克号式”的悲剧。在人们醒来并争论我们真的需要做点什么之前,很有可能一场大灾难已经发生。这场灾难有多大?它会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不知道。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显然不够大,袭击孟加拉的飓风级别也不够大。也许当一些像浦东、伦敦或纽约等大的沿海城市成为受害者时才够大?我刚刚从新闻中得知纽约的地铁和公路隧道因为一场风暴遭受了水灾。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某一时刻,大规模的自然灾难会改变人们对于需要做什么的认知。

我并不是那么悲观。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包括更少的干涉与更少的治理。也许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地区化的世界。所以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大国应该少关注一些彼此,多关注一些地区和邻国,因为那里是国际关系行为最频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欧盟有着充分的准备。虽然它还有很多麻烦,但至少它对于集体思考与集体行动有更多的机构和框架。此时的东亚还没有做好准备,东南亚也没有。这是一个多元的景象。如果没有人能够或是有意愿承担治理的责任,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地区化的世界。没有人打算重温上世纪30年代,因为那曾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灾难。没有人能够负担起那么做的代价,我认为每个人都理解这一点。

刘:您知道我有机会接触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我发现很多留学生都对西方怀有深深的疑虑,怀疑西方是否愿意给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空间。近年来我个人的一个关注点是在未来的世界中,崛起中的国家,比如中国,如何与西方相处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规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也愈加富裕起来,但中国还没有完全找回文化上的自信。我鼓励中国的学生参加国家汉办项目,走出国门去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但我提醒他们在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化使者之前,一定要先充实自己,加强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在走出国门之后,不仅要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且是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话者,要学习和研究目的地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比较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异同。因为我相信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将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借鉴的基础上的复兴,是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的复兴,甚至是重塑。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不仅仅是经济的开放,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开放;不仅仅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英国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学习时,您和我曾就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哪个更重要展开过讨论。实际上,中国人通常把“改革”与“开放”视为同一个概念或至少是同一个过程。您当时提出“开放”更重要,因为“开放”是“改革”的前提和条件,现在看来您的观点有相当的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中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交流和融合?西方的领导人经常呼吁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作为现有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和领导者,西方国家能够,或者说愿意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国家分享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和领导权吗?抑或是非西方国家在与西方分享世界责任的同时必须接受或分享西方的价值观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您前几天的演讲令我产生一个印象,就是您相信西方国家或西方社会愿意给予东方国家成长的空间,那么,您有没有考虑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

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将从这一观念开始阐释我的见解,那就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多数,俄罗斯可能除外,都采用了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差异比过去200年已经大大减少了。在20世纪,我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纷争相互厮杀。那个斗争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支撑经济、外交、国际法以及其他别的事情,甚至是政治的共享观念的根基已经大大强化,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仍然存在着很多文化差异,但从原则上讲,资本主义与文化差异之间没有矛盾。资本主义会将文化差异转化为商品,并在旅游业、不同的食物和时尚中将文化差异兜售出去。资本主义喜欢市场中的多样性。你能在英国看到众多的文化融合的现象。加拿大和其他地方也是很好的例子。巴西则是另一个众多文化融合的例子。所以我不认为文化差异是一个大的问题,与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相比肯定不是。自从现代性兴起之后,主要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已经缩小,而我的乐观也基于此。

很多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文化,这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孙子兵法》是在西方被阅读的最广泛的中国经典之一——很有可能是最广泛的。但是每一个读过的人都可能会感到,书中所传递的基本内容就是战略性欺骗。这就是中国人希望我们了解的中国文化吗?这种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文化之间关于人权的观念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女性的割礼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即使有人宣称那是他们的文化并希望得以保留。女性的整体地位依然会使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社会产生紧张关系。就性别而言,中国坚持男女平等。所以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也许和西方处于同一阵营。继续压迫女性

的社会、剥夺女性的教育权及其他权利,这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不能接受。即使不是从自由的角度,性别平等也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所以这里一定有一些文化的冲突。在我看来,文明的冲突发生在存在着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和单一文明主义的上个世纪,西方人是从文化等级制的角度来观察它,而现在主要关注于文化融合及多元文化主义。虽然文化间存在着分歧,但是也存在着宽容的氛围。

我并不担心文化会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大的议题。但具体说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或是它的一些本质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一个稳定的方式与现代化成功接轨。土耳其也许是一个例外,但是多数伊斯兰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们依然发展不健全而且不稳定,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西方准备好分享领导权了吗?我认为在这里你不能说“西方”。我认为你应该做一个清楚的区分。我不知道你是否将日本也归为西方,但是你需要将美国和欧洲区分开来。欧洲人对于分享领导权完全没有问题。他们会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和其他崛起中的国家愿意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我想欧洲人担忧的问题在于新兴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美国有问题。美国要适应其作为非超级大国的身份确实非常困难。你可以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里面充满了荒诞的话语,一个候选人如果不大肆鼓吹美国仍然是世界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心、美国负有领导责任、人人都应追随美国,是完全不可能当选为总统的。这种思维方式已深深植入美国政治。对美国人来说,适应美国作为非超级大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将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国家能够迅速地取代他们。他们作为众多大国中的超级大国会在很长时间内维持首要的权力地位。但是他们正在失去合法性和物质能力来扮演支配性的超级大国角色,他们对此也会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在美国更自由主义的观点,如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已经在主张美国需要从一个单一的领导角色向众多领导者之一转换,当然其仍是众多大国中的第一大国。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仍然非常强大,其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如果你陷入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中,冲突就是无法逃避的事情。对于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同样如此。他们认为中国不得不与美国竞争,权力转移危机一定会发生。他们不会想到其他道路,因为冲突的逻辑已经深入他们的理论之中。这个理论是一个自我应验预言。所以如果中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向对方施加影响的话,他们制造出来的这种自我应验预言有损两国关系,对于两方都是真实的危险。中国有很多现实主义者,这种现实主义有可能成为主导思想。如果中美两国以这种方式考虑对方,这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担心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是另一场大国间的战争,但是却有可

能存在着紧张和糟糕的国际关系。我不认为欧洲会加入美国所领导的针对中国的冷战中去。关于这个问题,争论是相当开放的。从外部来看,中国的未来存在着非常多的可能性。中国在国外引起不安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明显。但是我们不知道与这种物质力量相配的是何种政治规划。

刘: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见解有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地方,特别是认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西方有可以沟通和融合的地方。您认为全球经济体都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方式,但中国人自己则认为中国是通过改革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仍然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不变,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您研究国际关系多年,并在近年来多次到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中国有种说法,叫旁观者清。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中国对于西方是否存在着偏见?同时,欧洲和美国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这种偏见是否造成了双方的误解?您知道很多欧洲的经典作家曾经把中国描述为理想之地。

布:是的,他们将中国视为楷模,特别是中国选贤举能的做法对欧洲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于偏见,这很难讲。我正试图厘清我头脑中关于“偏见”的概念。你知道外国人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知,因此偏见是几乎难免的。再回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对于维持现状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问题。这种普遍的心态经常是指中国的,其根据就是中国的未来尚不明朗。与此同时,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中国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尤其是人权主义者会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有一定偏见。如果你把这种观点同现实主义对崛起国的想法合在一起,就会很容易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不自由的崛起的大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这仍然令人害怕。人们不了解中国,绝大部分对中国的认知也是透过人权和现实主义等某种程度上扭曲的透镜过滤得来的。当代中国的这些方面被夸大,而其他方面又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就产生了对于中国的偏见,尤其当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也会催生外部的恐惧和忧虑。

就像我说的,中国并没有成功修复这些扭曲的外部形象,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尚不明确未来中国往何处去、会变成何种模样,另外则是因为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混杂感到不解。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一部分是建设性的、和平的,而另外一部分则不是。如果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政策得出一个混杂的印象,他们最基本的反应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主义的忧虑,做最坏的准备并强调中国负面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就像我之前所讲述的那样,为了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对邻国的政策必须是非常连贯的和正面的。现在中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就是对“中国特色”这一术语的担忧。这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术语,但却非常强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并由此产生各种解读:一是中国

非常大,是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是最后一个被拉进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的地方。中国不停地重复讲“中国特色”,那么这就会变成现实。中国的一切都需要有中国特色。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文化的独特性和内向封闭性。与之相反,美国的文化是外向开放的。美国人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并能够成为他们一样的人,而中国人认为没有人能够或是应该像他们一样。因此,“中国特色”意味着如果你想参与其中,你就要先成为中国人。人们的这种印象会随着与海外华人的接触而进一步加深。国外有很多华人团体。50年前我在一个华人社区附近长大,认识很多华人。我认为华人社区比其他外国人社区更加封闭,如果说我的观察是一种普遍情况的话。华人社区有自己的规则,并且一般不参与当地政治,与当地的法律、警察联系甚少。他们经营自己内部的生意。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有些经济活动甚至是非法的。海外华人社区传统上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他们迁入的社会是非常种族主义的,迫使他们成为聚居区,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愿成为聚居区,加强团结以防止被同化。我想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这样看待华人社区。不过现在这种印象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地方正在发生改变。20年或30年前的北美华人社区和现在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在那里的华人已是第四、五或是第六代移民。以我所成长的城市温哥华为例,那里的华人已不再住在聚居区里。当时我所就读的高中里面只有两个华人,因为华人都住在城市的一个角落。而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有华人,并且华人在学校系统中的分布很广泛,也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社区已经扩散开来并被同化。但是我认为这种在国外保持强大社区的文化习惯强化了华人的典型印象:中国人与众不同并且排外。中国和全世界的其他文化相比体现出一种异类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差异是被刻意保持的。这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不确定感。也许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就像温哥华发生的一样。新一代华人在文化上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就像现在很多伦敦的华人那样。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和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都会促进文化的融合,这也许将会消除文化上的偏执印象。当然,这需要时间。

刘:您的观点很有意思,那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您愿意为中国提供一些建议吗?

布:我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答案:和平崛起。这绝对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如果方式得当,它会解决很多的问题。这首先需要中国从和日本缔结友谊开始。尽管很困难,但在我看来这是最为重要并且关键的一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其他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从战略意义上说,实现这一点的回报是巨大的。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是中国所面对的最长期的问题,那么对中国来说,

削弱美国影响力最好也是最安全的战略就是格外友好地对待中国的邻国,并在东亚创造出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如果中国能做到这点,就将切断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驻军的根基。美国很难对此表示反对:你如何能够反对中国对其邻国释放善意呢?但对美国来说,这会破坏美国在该地区驻军的根基。我不需要为中国出谋划策,因为中国已经找到了办法,所需要的仅仅是将其付诸实施。

刘: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与世界》的采访,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刊物。您今天对当代世界的转型,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与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欧洲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并对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战略性建议。我相信中国的读者虽然不一定同意或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但会感谢您作为旁观者对中国的关注和战略性建议。希望我们今后有机会对今天讨论的主题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谢谢!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闫博根据录音翻译整理)